

● 历史学

唐代长江流域民俗文化散议⁽²⁰⁾

刘 礼 堂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礼堂(1963-), 男, 湖北大悟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摘 要] 唐朝长江流域城市居民和乡村的文化生活日趋活跃, 民俗风情异彩纷呈。拙文所论述的唐代长江流域的民俗, 绝大部分是从前代传承而来, 它与唐代以前的民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研究唐代长江流域的民俗, 使我们认识到, 一个区域、一个时代的民俗文化, 正是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 民俗文化的核心实质是国民品格的表现, 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内在层面。

[关键词] 唐代; 长江流域;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17-05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 其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中国古代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 唐安史乱后, 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 长江流域经济的勃兴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城市居民和乡村的文化生活日趋活跃, 民俗风情更是异彩纷呈。拙文仅对唐代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予以初步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饮茶风气的盛行

唐代在长江流域民俗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迹象乃是饮茶风气的逐渐流行。南人饮茶的习俗被认为肇端于三国时。《南窗纪谈》称:“饮茶, 或云始于梁天监中, 事见《洛阳伽蓝记》, 非也。按《吴志·韦曜传》: 孙皓时, 每宴食, 无不尽日座席。无能否, 饮酒以七升为限, 虽不悉入口, 皆浇灌取尺。曜所饮不过二升, 初见礼异, 时或为裁减, 或赐茱萸以当酒。如此言, 则三国时已饮茶, 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 榷利与煮酒相抗, 迄今国计, 赖此为多……”^[1](第 59 页)。这是宋人根据史书记载所作的说明。再搜索一些史料, 说明饮茶之风不仅限于吴地, 南方各地均已兴起饮茶之风^①。陆相《毛诗疏议》曰:“椒聊, 聊语助也。椒树似茱萸有针叶, 叶坚而滑泽, 蜀人作茶, 吴人作

茗, 皆煮其叶以为香”^[2](卷 958, 第 211 页)。《封氏见闻记》称“南人好饮之, 北人初不多次”^[3](卷 6, 第 215 页), 茶产自南方, 故“好饮之”之风也首兴于此。唐开元中, 饮茶之风始传入北方, 而中叶以后, 饮茶之风大盛^②。

唐代著名的产茶地以长江流域等地为盛。声名显赫的茶叶, “剑南有蒙顶石花, 或小方, 或散牙, 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 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 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芷、茱萸、夔州有香山, 江陵有南木, 湖南有衡山, 岳州在邕湖之含膏, 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婺州有东白, 睦州有鸠坑, 洪州有西山之白露, 寿州有霍山之黄牙, 蕲州有蕲门团黄, 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4](卷下, 第 45 页)。各地茶叶产量很高, 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北)“每年出茶叶七百万驮, 税十五余万贯”^[5](卷 28, 第 672 页)。白居易在浔阳江口所见的商妇, 其夫即是茶商, 《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 正好道出了浮梁是当时享有盛名茶叶产销地。

促进饮茶风气兴盛的关键人物是陆羽。陆羽(公元 733-804 年), 字鸿渐, 一名疾, 字季疵, 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自称“桑苎翁”。“性嗜茶, 始创煎茶法, 至今鬻茶之家, 陶为其像, 置于炆器之间, 云宜茶

足利”^[6](卷 3,第 79 页)又,“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4](卷中,第 74 页)。由此可见,陆羽最先发明煎茶方法,从而促进了饮茶风气的兴盛。长江流域不少地方都因茶获利,以至于人们将他作为神灵供奉^③。

饮茶之风首先由长江流域墨客官宦倡导推行。起先,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文士官吏将刚刚焙好的茶叶包装密封,寄送给远在北方的亲友同僚,以示问候。到后来,寄茶叶逐渐成为士人间相互交往的一种高雅举动,从而也赋予饮茶风习丰富的文化内涵。如白居易有《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萧员外寄新蜀茶》;李德裕有《故人寄茶》,李群玉有《龙山人惠石稟方及团茶》,等。此外,杨嗣复、刘禹锡、柳宗元、薛登等人均以赠茶为内容的答谢诗存世。文人雅士将采摘制作的新茶寄给远方的文友,在书札中切磋茶道,并以诗唱和,不仅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使文友的品尝、唱和更具趣味性与艺术性,而且对长江流域各地的名茶起到了宣传作用。文人官吏对所寄茶各有所好,如诗人白居易就非常喜欢四川的蒙山茶,有“茶中故旧是蒙山”^[7](卷 448)之句;而唐末诗人薛能则对四川的鸟嘴茶情有独钟,吟“此惠敌丹砂”^[7](卷 560),以示赞叹之情。前述李德裕所收新茶显然寄自四川,而李群玉诗中的石稟茶则产于湖南。

唐代长江流域常见的饮茶方式除一人独饮和二人对饮之外,二人以上的茶会也风行于江边、寺院、亭林之中,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品茶宴会,将长江流域的饮茶风气推向高潮。武元衡《资圣寺赍法师晚春茶会》所记茶会^[7](卷 316),即在佛寺中举行。而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所描写的茶宴则是盛产名茶的顾渚山上举行的。顾渚山位于常州、湖州两州的交界处,每年早春二月采制茶叶,两州太守必亲临其地,邀请当地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前来品尝新茶,并举行盛大的茶宴。白居易诗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涕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7](卷 447)。茶宴规模宏大,且有乐伎歌女助兴,但品尝顾渚紫笋茶则是压台的节目。这种集娱乐、品尝、聚会于一体的地区性文化活动,是茶文化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的生动体现。

二、“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

由于长江流域自然环境、农业经济的特点和其它相关因素的影响,吴越之地早就有“信巫鬼、重淫

祀”的习俗。瞿宣颖先生认为:“咒术盖传自越人。”“巫术自越传来,故南诸郡多习之”^[7](卷 568,第 235 页)。吴泽先生也指出:“(六朝以降)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成为城隍神信仰的中心地区”^[8](第 105 页)。

在这种风气的儒染之下,当地民众历来所崇拜的诸神名目繁多。奉祀他们的祠庙,即所谓“淫祠”^[9](卷 31)。虽然此类现象其它地方也有,但“似淫祠之俗,南方为甚”^[10](第 57 页)。

隋朝统一全国后,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虽有所变革,但崇巫淫祀之风依然流行。隋朝末年瓦岗军与王世充指挥的隋军交战,王世充就利用部下“多楚人,信妖言”^[11](卷 186,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条),诈言周公助战,以鼓舞士气,结果,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这次战斗中全军覆没。唐朝建立后,这种“重淫祀”的习俗,已成为故吴楚地区人民的沉重负担,也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金陵(今南京)东阊门有吴泰伯庙,“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12](卷 280)。洪州有千年古树,“远近崇敬,或索妇女,或索猪羊”^[12](卷 315)。另外一些地区每年 10 月举行赛神会,善男信女齐集神庙,旷日持久,百姓颇受其害^[7](卷 398)。正因如此,不少在长江流域地区任职的地方官对此风极力抵制,产生了移风易俗的功效。《旧唐书》载:“(仁杰)入拜冬官侍郎,持节江南巡抚吏,吴楚多淫祠,仁杰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扎、伍员四祠而已”^[13](卷 115,狄仁杰传)。“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顽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论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后则祠之,四群之内,陶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13](卷 174,李德裕传)。除了上述 2 次清理外,一些江南的地方州刺史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新唐书》卷 172《于頔传》云:“未几,改苏州,罢淫祠,濬沟浚,端路衢,为政有绩”^[14](卷 172,于頔传)。这些州官禁止淫祠的具体原因虽然不一,但他们所采取的治策的相同,表明这决不是出于偶然,因为禁止淫祠的问题,已为当时舆论所关注,官吏所共识。

然而不断禁废淫祠举动的本身,却是说明了淫祠不易清除。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曰为漓柱泉。后人立栋

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伍员庙六神像者,五分其有髯,谓之五髯鬚神。如此皆言有巫者多矣”^[6](第 180 页)。这是因为根植于人们意识形态深处的东西,不单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轻易除去的,更何况当时江南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并没有质的影响。

三、民间歌舞

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以巴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均有着丰厚的文学艺术土壤,各自孕育出楚、巴歌舞。宋玉提到的《下里》、《巴人》,就分别是楚歌和巴歌的代表作品^[14](卷 160,韩愈传)。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民族艺术历汉魏六朝,至隋唐余韵尚存。

在唐代乐坛上,楚音依然是强音。《旧唐书·音乐志》曰:“自周、隋以来,……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13](卷 28,志八·音乐一)。唐代祖孝孙作“大唐雅氏”,就是根据“杂用吴楚之音”^[13](卷 19,祖孝孙传)的梁、陈旧乐斟酌考定而成的。唐欧阳衮《听郢客歌阳春白雪》诗云:“连连贯珠并,袅袅遏云频”^[7](卷 512),其中“阳春白雪”即为楚歌代称。与此同时,巴歌也同样获得巴地人们的青睐。于是,在巴楚文化碰撞融汇的峡江地区,出现了《竹枝词》这一新的曲体,而促使这类曲体诞生的首功当推刘禹锡^①。

刘禹锡《竹枝词》序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县),里中歌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声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至于今荆楚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声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音,知变风之焉”^⑤。

除刘禹锡对《竹枝词》的渊源作过较为全面的阐释外,千余年来,关于《竹枝词》来源的见解可谓仁智互见。

但笔者认为,“竹枝”是唐代《乐府诗集》收集的民歌,乃当时文人仿作。“竹枝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俚中儿歌之,由于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其音协黄钟羽,未知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15](卷 81,近代曲辞三,竹枝)。

时值今日,号称巴头楚尾的峡江地区仍流行一种接近《竹枝词》的民歌。由此可见,《竹枝词》是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民间歌乐的典型形式,它是传统和声形式发展演变的结果。

在唐代,荆楚舞蹈依然超越时空,表现出极大的魅力。

在唐人的诗句中,楚舞尤其是巫舞常常是赞美的对象,而巫舞又是楚国最负盛名的舞蹈。据汉王逸《楚辞章句》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这就是说,楚国巫舞以南方为盛,被世人誉为千古绝唱的《九歌》就是屈原在观赏了南楚巫舞后的神来之笔。

那么,请看唐代诗人笔下长袖细腰的灵巫和舞女是何等婀娜多姿,楚楚动人^④。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曰:“荆巫脉脉传神话,野老婆娑起醉艳。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7](卷 399)。

张祜《舞》诗曰:“荆台呈妙舞,云雨半罗衣。褰褰腰欲折,褰褰袖欲飞”^[7](卷 883)。

裴谔《储谭庙》诗曰:“女巫纷纷常下舞,色似授兮意似兴”^[7](卷 887)。

杜甫《南池》诗曰:“南有汉玉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7](卷 220)。

白居易《留比客》诗曰:“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7](卷 461)。另一首《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曰:“舞急征腰软,歌迟翠黛低”^[7](卷 456)。

杜牧《遣怀》诗曰:“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7](卷 524)。

刘希夷《春女行》诗曰:“春女颜如玉,怨歌阳春曲……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7](卷 82)。

李涉《竹枝词》诗曰:“十二山晴花尽开,楚宫双阙对阳台。细腰争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下来”^[8](卷 477)。

类似的诗句在《全唐诗》中枚不胜数。很难设想,如果楚舞在唐代没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诗人没有亲眼看过楚舞的表演,仅凭想象是不能把楚舞的形貌、神韵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令人神往的。

四、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之俗源远流长,远古的人类,人们对大自然无法正确认识、理解,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产生了对大自然的神秘性、软弱性和依附性,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对大自然的一切,其中包括某种带有民族标记的图腾动植物加以神化和崇拜,用以寄托征服自然的理想和愿望,龙舟竞渡这一祭祀民俗活动便应运而生。

到隋唐时期,已成为长江流域水乡一项集群众

性、竞技性为一体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竞渡是端午节一项最为激动人心的大事,是日,人们将早已准备好的龙舟施朱重彩,装扮一新,男女老幼齐集江边,先在招屈亭旁举行盛大的招寻屈原亡魂仪式。随后,三声鼓响,精彩的竞渡活动全面展开。刺史、县吏多在江边观看,据称“刺史临流褰翠帟,揭竿命爵分雄雌”。划龙舟的壮士们高喊“何在”、“何在”的号子,以示招寻屈原魂灵之意^[7](卷 356)。岸边围观的百姓组成声势浩大的啦啦队,给各自的龙舟队加油。唐代诗人张建封《竞渡歌》,描写荆楚一带龙舟竞渡的盛况有云:“五月五日天晴朗,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綵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7](卷 275)。端午龙舟竞渡,不仅盛况空前,而且旷日持久,往往“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饬良吉,会客陈膳羞。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7](卷 398)。即龙舟竞渡延续时间很长,贻误农时,加之当地老百姓对胜负输赢十分看重,有时竟出现“疮眉血首争不定”的情况。有鉴于此,一些地方官曾设法予以禁止。但时过不久,由于当地百姓的请求,又重开竞渡。如元稹在浙东观察使任内,即对竞渡的弊端多有所了解^[7](卷 398),曾拟禁止。但在当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只得在镜湖(今浙江绍兴县南)上建东武亭,“亭至宏敞,春秋为竞渡大设会之所”。李绅后至浙东任观察使,又“增以板槛,延入湖中,足加步廊,以列环卫”^[7](卷 481),可见,在浙东一带,龙舟竞渡是禁而不止。元和时宰相王播少时居扬州,当时杜亚为淮南节度使,“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12](卷 278)。又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皆高数丈”^[16](卷 3)。其场面之大,耗资之巨,于此可见一斑。

五、余 论

中古民俗文化作为历史学或历史文化、民俗史、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值予以关注和探讨。以其中

一历史时段或地域为中心,就散见于诸种文献的民俗文化资料详加勾稽、梳理与辨析,并与考古文物资料相印证,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基本类型、渊源与流变、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历史特征,从而深化并拓展历史学包括断代史、区域史、社会史、民俗史、文化史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清理、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或提炼出先民在世代相传的群体文化范式、习尚中的民族精神或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分,对于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情教育等,亦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风俗是人们在适应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漫长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习尚差别,是一种文化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且代表着传统和文化惯力的一个层面。与文化构成的其他层面相比,它的传承性大于变异性,稳固性大于流动性。因此,拙文所论述的唐代长江流域的民俗,绝大部分是从前代传承而来。它与唐代以前的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饮茶从三国时即开始,南人饮茶,北人饮酒,也相对成为各自的饮食习惯;“淫祠”多属地方崇拜,在长江流域尤其江南十分普遍。它反映了一种区域文化特色;民间歌舞笔者只记述了长江中上游,对长江下游的“吴歌”、“西曲”并未涉及;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投江 1 000 多年,上古南方水居民族的祭龙习俗,但若探究端午节日的缘起,则始于汉晋之际的荆楚地区。从南朝至今,端午竞渡之风以西湖地区最盛,其次为江浙、四川,再次为闽越等地,影响所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国家也接受了端午竞渡之俗。笔者仅描写了端午竞渡节日之场面,至于端午竞渡的渊源、传播路线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是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就中古习俗、文化的某些侧面进行探讨,而从整体上对唐代长江流域的民族文化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利用出土文物并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俗者亦尚为少见。特别是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民俗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作。进一步发掘新的资料,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从历史的脉络和地理的视角来探讨这一民俗文化地域差异,将这一区域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将是一个专门的课题,笔者因限于学力,有待于今后继续探讨。

注 释:

① 参阅能铤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

② 参见林正三:《唐代饮茶风气探讨》,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1980年第 2 辑。

③ 参见李学勤编:《长江文化史》第 5 章(朱士光、拜根兴撰),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 版。

④ 参见杨匡民:《荆楚歌乐舞》,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⑤ 参见《全唐诗》卷二六五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

[7] 彭定求,沈三曾.全唐诗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摘抄 [Z]. 上海:上海书店,1985

[9] 魏徵.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李昉.太平广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刘昫.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 郭茂倩.乐府诗集 [Z].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 王谔.唐语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7] 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参 考 文 献]

[1] 无名氏.南窗纪谈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印影本,1991.

[2] 李昉.太平御览 [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李肇.唐国史补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赵璘.因话录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 琳)

Folkways Culture in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Tang Dynasty Scrappy Comments

LIU Li-t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Li-tang (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residents in city and countryside was dynamic increasingly in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lkways emerged numerously and complicatedly. Most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s folkways of Tang Dynasty expounded by the present writer in my humble article came from pre-dynasty, it is bound together by countless ties to the folkways before Tang Dynasty. By studying the folkways in Yangtze River Valley of Tang Dynasty, we realize that the folkways culture in a valley, a era is exactly one of the main carriers of its civilization, the core of folkways culture is expression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at is the most internal aspect of a country, a nation.

Key words Tang Dynasty; Yangtze River Valley; folkways culture